

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史部

# 明抄本万历起居注



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史部

# 明抄本万历起居注(一)

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史部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 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出版委员会

顾问 问

任继愈

傅璇琮

陈翔华

李 竞

阳海清

主任编委

张彦博

副主任编委

李 健

宫爱东

刘小琴

常务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燕远

张志清

李国庆

邹华享

徐大平

彭邦明

韩锡铎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若

王大伟

王水乔

王建福

王清原

兰天阳

石洪运

刘 飞

刘慧娟

孙孝诗

何远景

何振作

张文增

李达麟

李勇慧

陆娴武

周 骥

周新风

林子雄

林学军

姚 倩

姜亚沙

赵淑琴

徐光煦

袁长江

贾晓东

常培俊

谢水顺

阚 华

潘寅生

潘猛补

特约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邵国秀

陆宏基

常书智

谢忠岳



《明抄本万历起居注》编辑委员会

顾问 南炳文

主编 陆行素

副主编 孔方恩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学松 万群 王永华 王向峰 白莉蓉 刘桂芳

孙连青 张岩 张建国 张金环 张磊 李国庆

苏虹 季秋华 胡永晔 袁彤 常虹 翦安

## 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前言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极其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文化曾对人类的进步，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世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促进了西方的现代化。而其中纸与印刷术的出现，引起了书籍制作的重大变革，并由此促使这一人类思想文化的载体得以大量生产，促使人们所创造的知识得以迅速传播，从而大大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程。公元十八世纪前后二百年间，欧洲一些思想家为反对愚昧的宗教势力，便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理论武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伏尔泰，还曾主张「全盘中化」。他所构筑的社会学说中，显然汲取了儒家的思想文化。近年来，「中国古典智慧热」在日本等国兴起，《周易》、《老子》、《孙子兵法》、《三国志演义》等八种古籍风靡于世界。因此，对待古代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是毫无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的。今天，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我们诚然应该大力汲取世界各国先进而有益的科学文化，但是弘扬祖国的民族固有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不仅是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及维系华人社界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有助于借鉴历史或开启智慧，以提高我们处理问题与应变时事的能力。

近代以来，作为我国传统文化载体的古籍，主要聚集于图书馆，而各级公共图书馆所藏尤多。今以公开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为例，此《善本书目》共著录史籍一万五千七百零八种，而公共图书馆却藏有一万二千六百十九种，占总数百分之八十三（其中公共图书馆独家所藏九千八百九十五种，约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三）。至于其他古籍，公共图书馆也保存得最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除少数图书馆外，许多公共图书馆所藏具有重要价值的古籍文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和利用。

有鉴于此，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与有关省市公共图书馆于一九九二年，在杭州成立了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协同各成员单位，发掘与抢救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藏文献资料，编纂《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品汇刊》，以保存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本汇刊的主要内容与范围，包括珍贵、稀见的古籍文献资料，即珍本秘籍，罕见的抄本、异本、名人稿本、佚文、信札、墨迹，稀见方志、舆图、谱牒、档案文告、甲骨金石、彝器铭文，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普通古籍以及少数民族重要文献等。

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的成员单位为：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市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长春市图书馆、吉林市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馆、哈尔滨市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大学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桂林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重庆市北碚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以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敬请专家与读者多予批评指正。

### 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三月于北京

## 《万历起居注》的价值和版本（代序）

南炳文

笔者最早听说《万历起居注》一书，是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大学学习史学史课程之时。那时已从谢国桢先生的名著《晚明史籍考》、陶元珍先生刊载于《文史杂志》第四卷第七、八期合刊（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万历起居注》一文，以及其他有关史学史著作，得知中国自很早的时候起，就已经开始为帝王记注起居，而现在仍旧存在的大部头的帝王起居注，乃是以《万历起居注》为最早，它为研究近五十年之长的万历一朝的历史，提供了数量很大的宝贵资料。但当时笔者得知信息，是现存《万历起居注》一书只有一部明抄本，收藏于天津图书馆善本部，为了保存好这部海内孤本，非有特殊批准手续，不能提出阅览。加之当时笔者也没有研究与此书有关的课题，因而没有设法一睹该书的真面目，也没有这种想法。

本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笔者与汤纲先生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撰写明朝的断代史（最初的书名拟为《明代史》，但正式出版时出版社方面因与该书视为同属一套丛书的该社所出其他断代史，在书名中皆不用“代”字，如王仲孳先生的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断代史称《魏晋南北朝史》，林剑鸣先生的关于秦汉两朝的断代史称《秦汉史》，杨宽先生的关于战国时期的断代史称《战国史》，提出去掉“明代史”三个字中的“代”字，改名《明史》。于是最后该书面的名字竟与《二十四史》中的张廷玉《明史》重了名），万历一朝的政治经济是笔者承担的任务之一。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笔者曾前往天津图书馆借阅《万历起居注》。其时图书馆方面，

按规定只准用缩微阅读器阅读该书的缩微胶卷。这种阅读方法很费眼力，但毕竟可以达到阅读的目的，心中甚喜，不顾炎夏的酷热，上身钻进缩微阅读器的罩壳里，忍受着上百度电灯泡的炙烤，边读边抄。然而好景不长，阅读数天之后，缩微阅读器发生故障，阅读被迫中止。笔者和汤纲先生合写的《明史》一书中，最终未能使用《万历起居注》的资料，这是至今感到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一九八八年十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万历起居注》。这是《万历起居注》传世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此书有了学者易于找到的通行本。在高兴之余，笔者也感到吃惊：原来《万历起居注》并非只有天津图书馆收藏的一个本子。不久，随着中国与日本学术交流的日益活跃，笔者又读到了日本学者今西春秋先生《关于明起居注》（一九三四年《史林》第十九卷第四号）、《关于明起居注补正》（一九三五年《史林》第二十卷第一号）、《明季三代起居注考》（载田村实造编《明代满蒙史研究》，一九六三年十月京都大学文学部发行）等三文，以及山根幸夫先生《关于阿波国文库所藏〈大明实录〉》（载《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一九九〇年三月中华书局出版）一文，这更使我了解到在日本也有《万历起居注》一书。于是，笔者对《万历起居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此书目前究竟有多少种版本？各版本有何异同？此书的内容如何？在提供研究资料方面究竟有何价值？一系列想要搞清的问题经常出现在脑海之中。

本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其后半段，为了解答上述问题，笔者将许多时间花在研究此书上。在有关部门和友人的帮助下，笔者查阅了中国国内的大量有关资料 and 原书，今年初又在山根幸夫先生的帮助下查阅了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原书。数年的调查研究，使笔者对《万历起居注》一书的了解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增加。下文所述，即是笔者数年调查研究的心得。



《万历起居注》的价值主要是为两种场合提供资料。一是明神宗死后其继任者组织人员为之编写实录时，二是后人研究万历时期的历史时。该书编纂的本意是为第一种场合提供资料，但今天讲来，其价值乃在为第二种场合提供资料。

那么《万历起居注》在什么范围内为研究万历时期的历史提供了资料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应该看一看万历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大学士张居正为恢复起居注编纂制度所上奏疏中所述关于国史馆为后日编写实录而平时分类编辑资料的规定，这一规定中包括有起居注的记载资料范围的规定，并且得到了明神宗的批准，在《万历起居注》的编纂过程中被认真贯彻执行。这一规定说：『合令日讲官日轮一员，专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勅、册文等项，及内阁题稿。其朝廷政事见于诸司章奏者，另选年深文学素优史官六员，专管编纂，事分六曹，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每人专纂一曹……每月史官编完草稿，装为七册，一册为起居，六册为六曹事迹。（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万历起居注》第一册第二七一—二七二页、第二七五页）。』由这段规定可知，《万历起居注》只是国史馆为日后编写《明神宗实录》而于平时分类编辑的七种资料中的一种，其编辑的范围并非无所不包，而只是包括明神宗的日常活动及有关言论、文书和其时内阁大学士的奏疏。在这里应予注意的还有两点：

第一，所谓明神宗的日常活动，并不是包括其全部活动，而主要是指其在外廷的活动，至于其在内廷的日常起居则并不包括在内，它们的记载属于与《万历起居注》不相干的另一种文献即『内起居注』的任务。明光宗的母亲王氏，原来只是慈宁宫的一个普通宫女，有一次明神宗到慈宁宫看望太后，偶遇王氏，一时高兴，『私幸之』，使怀下明光宗。但明神宗并不喜欢这个宫女，事后对此事不肯重提。太后对此事却很重视，她与明神宗谈论此事，明神宗以『无之』相答，于是太后令人拿来『内起居注』与之相辩。面对『内起居注』关于其与王氏那次相遇的

记载，明神宗只好老老实实对太后认输。这是文秉《先拨志始》卷上和《明史》卷一一四记下的一则史实，这一事实说明了「内起居注」记录明神宗宫内日常起居的情形。

第二，如所周知，明神宗在万历中期之后怠政严重，长年不出内宫，不见朝臣。因此，此后其在外廷的活动极为少见，这影响了《万历起居注》的记载内容，成为主要是其时内阁大学士的奏疏。本来由于内阁大学士的奏疏多半较长，早在《万历起居注》的万历中期以前的部分，它就在字数上超过了明神宗的日常活动及有关言论、文书，到了万历中期以后的部分，其所占篇幅的比例就更大得惊人了。

《万历起居注》记载资料的范围虽然并非无所不包，但其所涉及的朝政却是领域广泛的。无论是官吏任免、礼仪制度、财政经济、工程建设，还是练军开战、法律诉讼，管理边疆、交往外国，抑或社会风俗、宗教结社、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举凡需要朝廷过问的事情，无不涉及。这是不难理解的。明神宗作为其时国家机器的最高首脑，他便不能不去处理与朝政有关的任何问题，而内阁大学士作为明神宗管理朝政的主要助手，在处理其主管的若干具体事务（如组织书籍的编纂）外，对与朝政有关的其他任何问题，也不能不关心，不能不就此回答明神宗的任何询问，不能不就此主动观察思考并向明神宗提出建议。这样，《万历起居注》尽管只记载明神宗日常活动（以外廷活动为主）及有关言论、文书和其时内阁大学士的奏疏，而其涉及的朝政的领域不可能不是极为广泛的。值得注意的还有，《万历起居注》所记载的朝政不仅领域极为广泛，而且多半是其时朝政中最重要的、最紧迫、急需研究处理的问题，反映着其时朝政的热点。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明神宗和其内阁大学士，面临的朝政无论何时都是千头万绪的，而其精力是有限的，其能思考、处理的，只能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以及矛盾突出必须及时处理的事情，与之相适应，《万历起居注》也就自然形成了能够反映万历时期各阶段朝政热点的

样子。

无庸讳言，记载明神宗日常活动及有关言论、文书和其时内阁大学士奏疏的文献，不仅《万历起居注》一种，还有据《万历起居注》等编出的《明神宗实录》，以及万历时期内阁大学士的个人文集（或奏疏集）等（明人编刻个人文集的风气很盛，嘉靖之后更是热情高涨，因此万历年间的内阁大学士，多有自己的文集，或由亲友编成，或由本人亲自编辑，还有的专门将入阁期间的奏疏单独编辑成书）。但这些文献在记载明神宗日常活动及有关言论、文书或其时的内阁大学士奏疏上，皆不如《万历起居注》收录齐全而准确。

《万历起居注》之所以收录齐全，原因在于其编辑宗旨乃是为后日编写实录积累资料，因而不能不求齐全。这正如大学士张居正在其建议恢复起居注编纂制度所上奏疏中所说：「照得今次纪录，祇以备异日之考求，俟后人之删述，所贵详核，不尚文词。宜定著体式，凡有宣谕，直书天语，圣谕、诏勅等项，备录本文。若诸司奏报，一应事体，除琐屑无用、文义难通者，稍加删削润色外，其余事有关系，不妨尽载原本，语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事由颠末、日月先后，务使明白，无致混淆。（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万历起居注》第一册第二七四页）」这种「凡有」、「直书」、「尽载原本」之宗旨，自然就会使《万历起居注》所应载范围内的有关资料在其中收载得相当齐全。再加上该书的编纂是随着事情的发生而逐日及时进行的，无时日过久资料散失之虞，这对保证其收录齐全，也有很大作用。而反观《明神宗实录》诸书，其情况就大有不同了。如《明神宗实录》，与历朝所有的实录一样，其编写目的并不是编成最后的史书定本，而只是为了给后日编写最后的史书定本即纪传体本朝史作史料准备，但它毕竟较其编写的重要依据之一《万历起居注》离最后的史书定本更近了一步，它对《万历起居注》的有关记载不可避免地要有所取舍，这从其编写体例来说是无可非议的，但在保留尽量多的有关资

料供后人研究使用上，显然就无法与《万历起居注》相比了。内阁大学士的文集（或奏疏集）在收录其人的内阁奏疏时，一般会尽量收全。但是，由于这种文献往往编辑于其人生存的晚年或死后，集中完成于一段时间之内，资料的收集就难免发生因散失而遗漏。此外，本人或亲友为内阁大学士编辑文集（或奏疏集）时，因利害名义相关，或有故意删去某些篇章或段落之事发生。因而这种文献在有关方面也往往不如《万历起居注》收录齐全。

最近笔者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历起居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的《明神宗实录》和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李文节集》所收大学士李廷机在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至十二月、三十六年五月至三十八年四月所上内阁奏疏（李廷机担任内阁大学士的时间为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至四十年九月，但因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万历起居注》只存其中的以上两段时间的记事，只好以三书所记以上两段时间李廷机的奏疏作比较）作了一番对比，得知：这两段时期内李廷机所上奏疏总数为一一五篇，《万历起居注》收录一一四篇，仅失载一篇，所收诸篇皆为全文录入（发现漏字一百余，当为抄写之误）。《明神宗实录》仅对三十八篇摘录部分段落或述及该篇奏疏所述内容，根本未提及者七十七篇。《李文节集》收录一〇七篇，失载八篇，所收各篇间有删削，总数近二千字。这些统计数字在说明《万历起居注》收录有关资料最为齐全上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在对比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了数处《李文节集》顾忌李廷机的名义而作出的删节（如万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奏的一篇奏疏，删去了李廷机与名声不好的沈一贯一伙人的关系的一段话），对于分析《万历起居注》收录有关资料最为齐全的原因，极有好处。

《明神宗实录》等在收录有关资料方面不如《万历起居注》准确的原因，主要是在辗转抄写、改编、综合、润色文字的过程中，难免发生失误。这些失误多半是无意的，但因数量颇多，



对留给后世准确的历史知识极为不利。如《明神宗实录》卷四八万历三十七年五月辛巳朔记事载：「辅臣李廷机乞放。」这即是一条误载。《万历起居注》所载万历三十七年五月十七日李廷机所上「乞放疏」中有「臣今年乞休十有三疏」一句话，由之可知，在万历三十七年五月十七日以前，李廷机在此年所上乞休奏疏总共应是十三篇；而据《万历起居注》所载其奏疏，它们分别上于此年的正月二十一日、二十七日，二月九日、十七日、二十三日，三月一日、七日、十九日、二十五日，四月八日、十七日、二十八日，五月八日。可见绝无此年五月一日李廷机上疏乞休之事发生。《明神宗实录》的这一失误，当是由于编写者疏忽，看错了时间。《万历起居注》在编纂过程中，主要是照录原文，基本上不用改编、综合、润色文字，其所收录有关资料，失误较少，实为当然。

综上所述，《万历起居注》所记资料虽然限于明神宗的日常活动（以外廷活动为主）及有关言论、文书和其时内阁大学士的奏疏，但其所涉及的朝政却是领域广泛，而且多半是其时朝政中最重要、最急迫的问题，在记述同类资料的文献中，它也是收录最齐全、最准确的一种。由此看来研究万历时期历史者，对它确应重视。

通过最近几年的调查，笔者得知，《万历起居注》的版本既非只有天津图书馆的藏本，也并非上文提起的几种之外再无其他，而是数量颇多，至少有九种。

其一为前文所说的天津图书馆藏本。它是一九〇八年天津图书馆建馆后，至迟到一九一三年该馆改称「天津直隶省图书馆」之前，该馆通过采购而入藏的。该本系明人所抄，共五十册，分装七函，可称天津明抄本。其记事范围起万历二年至四十三年，中间或有残缺，实际共记四百零六个月之史事，其文字讹误、遗漏的错误相对来说较少。这是现存记事最多、错误较少的两种版本中的一种。

其二为前文所说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据山根幸夫先生的文章，该书最早属阿波国文库，后可能因明治维新时期发生了财政危机而将之卖出，约在明治十六年被帝国图书馆购进，后因帝国图书馆合入国立国会图书馆而成为现在的收藏状况。该书入藏阿波国文库之前，当是由长崎而从中国输入日本的。此本可称日本藏抄本。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与明太祖至明穆宗的各朝实录、泰昌起居注及部分天启朝起居注凑成了一套书，总名称为『皇明实录』。其各册的封面也是题为『皇明实录』，与其他部分的各册相同。其记事起于万历二年正月，止于万历四十八年八月，除去中间残缺者，共有五百三十九个月，它也是现存记事最多、文字错误较少的两种版本中的一种。

其三为北大元年明抄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除据它影印出版或据它抄出者外，其所记万历元年的内容，为其他版本之《万历起居注》所不载。

其四为北大五年及六年抄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或谓抄于明代，但从该本不用抬头顶格书写的表敬方式来看，其说值得怀疑，很可能是清代。其所记为万历五年及万历六年正月至三月的事迹，凡十六个月（万历五年有闰月）。这十六个月的事迹在天津明抄本及日本藏抄本中都有记载。

其五为傅氏藏旧抄本。此本著录于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中，乃傅氏于一九一三年从『四明书坊』购得。记事范围同上述北大五年及六年抄本。此书原书笔者未见，从其记事范围及傅氏藏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末后的散失情况分析，其殆即上述之北大五年及六年抄本。

其六为北大抄天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它为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间的某一年或某几年，由天津藏书家奴兼山雇佣抄手四人，据天津明抄本抄出。先为本人收藏，约于一九四

六年秋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之间转归北京大学图书馆。其记事范围完全同天津明抄本，但有許多抄误之处。

其七为天津元年民国抄本。藏于天津图书馆。民国年间据北大元年明抄本抄出，记事也是万历元年的十二个月。最初在天津图书馆书库中单独存放，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被编为第八函，与天津明抄本合成一书。同时合进来的还有《万历起居注校勘记》稿本二册，它被编成了第九函。这本校勘记没有注明作者，也没注明校勘何种版本的《万历起居注》，据笔者考证，其作者应为姒兼山，其校勘对象为天津明抄本，并兼校北大抄天本，凡校漏文、误字等一七五四处。

其八为台湾旧抄本。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笔者未见其原书，据黄彰健先生《明神宗实录校勘记》明神宗实录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其记事共一百五十八个月，脱页、讹字极多。但其万历四年九月及十年正月至三月共四月记事，为其他各本所失载者。

其九为定陵抄天本。收藏于北京定陵博物馆。为五十年代发掘定陵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将天津明抄本借出，由参加发掘的考古工作者照抄一份而形成的。

其十为北大影印本。此即前文所述一九八八年十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那一种。其底本是北大元年明抄本和北大抄天本。此本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的是未选最好的本子作底本，此为美中不足。

回顾以上所述，若如笔者所说，北大五年及六年抄本与傅氏藏旧抄本确是一书，那么现存笔者所知的《万历起居注》的版本，恰为九种。决定修《万历起居注》始于万历三年二月，但隆庆六年六月明神宗即位至始修《万历起居注》共二年多的事迹当时也决定追记下来，又明神宗死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这样，《万历起居注》记事所涉及的月份应为五百九十五个。但日

本藏抄本包括有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即明神宗死去的下一个月的事迹，所以，《万历起居注》记事实际包括的月份应为五百九十六个。这个数字，上述九种版本都没能达到。但若将它们互相抄补，则据笔者计算，可得到五百七十二个月，失载者只剩下二十四个月。此外，在选用底本上若再择善而从，并进行精心校勘，基本上恢复原貌的《万历起居注》版本就能出现。如果这成为现实，那将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啊！

按照张居正上疏建议恢复编写起居注时的意见，起居注写出后，是不准翻看的，要放入柜中，‘用印封锁’，‘永不开视’。但后来实际上并未认真执行，现存不少资料反映着其时内阁大学士随意阅览的实情。另外，在编写《明神宗实录》时又肯定是要提出参阅的。《万历起居注》虽然从未正式刻印，但却能流传于世，其原因当即在此。既然人们有机会看到它，就可以将之传抄出来。明人的私家目录中已有《万历起居注》的记载，这是明代私人已拥有此书的证明。今存各种抄本，当即这些传抄本的遗存或再传抄。

以上即是笔者关于《万历起居注》研究的粗浅心得。其详见于拙文《影印本〈万历起居注〉主要底本的初步研究》（载《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一九九七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万历起居注〉的版本》（载《史学集刊》一九九八年四期）、《〈万历起居注校勘记〉考述》（载《南开学报》一九九九年四期），以及尚未发表的《天津明抄本和日本藏抄本〈万历起居注〉》、《〈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和〈李文节集〉中的李廷机内阁奏疏》中。诚恳地盼望各位同行批评、指导。

二〇〇一年八月记于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



## 明抄本万历起居注影印出版说明

一、《万历起居注》是记载明朝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日常外廷生活及有关言论、文书和其时内阁大学士奏疏的一部史书。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凡朝廷过问的事情，无所不包。是研究明朝历史的重要著作。谢国桢先生称此书「乃研究万历时事最真实之资料也」（见《增订晚明史籍考》一九六四年中华书局版七十七页）南炳文教授说：「在记述同类资料的文献中，它也是收录最齐全、最准确的一种。」（见本书《代序》）今将天津图书馆珍藏的这部明抄本《万历起居注》影印出版，旨在将其化身千百，为研究人员提供第一手史料。

二、《万历起居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明神宗死后，其继任者组织人员为之编写实录时提供原始文献；其二是为后人研究明万历时期历史提供第一手资料。此书可订《明神宗实录》及本朝大臣奏疏之讹误，可补《明史》及相关史籍记述明万历朝史事之不足。

三、天津图书馆藏明抄本《万历起居注》，共计五十册，七函。记事范围起明万历二年至四十三年，旧佚元年、十三年、三十三年、三十九年、四十年和四十二年，实际共记四百零六个月史事。工笔端楷抄录，其文字讹误、遗漏处较少，「这是现存记事最多、错误较少的两种版本的一种」（南炳文教授语，见本书《代序》）。另一本指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今依原抄本影印，原书尺寸缩小，原本页次未作变动，以存其旧。

四、北京大学藏抄本，是民国年间据天津图书馆藏明抄本抄出的，其记事范围完全同天图本。一九八八年十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北大藏传抄本影印行世，虽为学人带来便利，然这个传抄本存在明显不足之处，即「有许多抄误之处」（南炳文教授语，见本书《代序》）。今将天津